中国作家需用心开采抗战文学富矿

□李西岳

2015年，我承担了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撰写解说词的任务，近一年的时间，我阅读了大量各种版本的抗战史料及相关文学作品，梳理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关于中国抗战的诸多特点，其中有开战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等。说开战时间最早，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打响了反对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与1939年9月1日德军闪击波兰，相较第二次世界大战起点早了8年；说持续时间最长，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中国抗战坚持了14年之久；说付出的牺牲最大，是指东方战场而言，中国抗战中伤亡3500万人，损失5000亿美元。

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毋庸讳言，在中国上百年来抵御外来侵略的战争中，惟抗日战争是最旷日持久的，也是最悲壮惨烈的，应该成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中最具“民族秘史”意义的一部分，它积淀成的文学富矿深厚而复杂，血腥而悲怆，为作家们深入持久的开采，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资源。如果梳理一下中国抗战文学史，就不难发现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在这座富矿里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开掘，在深耕细作中，淘出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抗战特色和品质意义的文学黄金。再做进一步梳理，大至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抗战期间，从解放区到敌占区，从国统区到抗日民主根据地，一大批热血沸腾的知识分子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创作出了许多具有强烈民族意识和时代气息的文学作品，如《生死场》《八月的乡村》《四世同堂》《吕梁英雄传》《风云初记》等。第二次浪潮，就是新中国成立至“文革”前（也称作十七年），这次浪潮来得相对有些猛烈，创作者大都参加过火热的抗战斗争，全国解放后，他们过上了安定日子，静下心来写了一大批主题鲜明、故事曲折、可读性强的抗战文学作品，如《平原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苦菜花》等。第三次浪潮是新时期以来，一些没有参加过抗战，却有较强实力的作家，他们依据阅读史料和丰富的艺术想象，写出了一批具有新的战争理念和某种反思意义的抗战文学作品，如《红高粱》《亮剑》《历史的天空》等。这三次浪潮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战文学景观，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创作的抗战文学作品，再现了不同的战争场景和面貌，留下了不同特点的抗战英雄形象，不仅丰满了中国抗战文学史，也生动形象地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

客观地说，作为军旅作家，我是第三次抗战文学创作浪潮中的一员，我的家乡冀中平原的热土曾被抗战的烈火燃烧过，被英雄前辈的鲜血浸染过，我是听着父辈们讲着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长大的。参军后，我所在的原北京军区部队前身是晋察冀军区，而冀中是晋察冀军区的腹地，也是产棉产粮的富庶之地，为华北敌后抗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战争资源。1942年，新上任的日军驻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扬言要摧毁八路军的战争血脉，用五万大军报复百团大战，对冀中平原进行拉网式、篦梳式、鱼鳞式清剿，所到之处实行“三光政策”，这就是抗战历史上的冀中“五一”大扫荡，那次大扫荡日军共杀害和掳走冀中军民五万余人，其惨状如电影《地道战》中所描述：“迈步登公路，抬头见岗楼。无村不戴孝，到处是狼烟。”也正如我的父辈所说：“那真是推了碾子又上磨，过了筛子又过箩，老百姓每天都在刀尖上行走，简直就不让你活。”可我英雄的冀中父辈们，凭着血性、顽强和智慧，喊着：“今年消灭希特勒，明年赶走小日本儿”的口号，在“三光政策”中挺过来了，熬过来了。经过十几年的思考沉淀，2012年我创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血地》。在我的小说面世前，关于反映冀中抗战题材的文学和影视作品，在三次抗战文学浪潮中已有相当多的数量，而且有着广泛的影响，面对无法超越的“大山”，我只好另辟蹊径，我把目光投入到民间抗战中去，投入到形形色色的小人物身上。这些人物几乎都没有高大全的英雄痕迹，而且在他们身上还存有某些人性弱点甚至斑斑劣迹，平时一片散沙，窝里斗，而抗战却把他们拧成绳子，一旦遭受外辱，他们便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在他们身上，闪耀着朴素的爱国情怀和人性光辉，如红军团长出身的李长生虽文武双全，不计杀父之仇的家恨动员村民抗战，却死活走不出亲情与爱情带来的尴尬；侦察员铁榔头嗜酒如命且与村里的小寡妇有染，但在反扫荡中站出来舍身掩护老百姓毫不含糊；大学生出身的抗敌剧社社长郭文秀因忍受不了李长生对她的批评连夜开了小差，在外一路寻找“实业救国”无果满怀羞愧归队；风流成性的小白鞋，大屠杀中本来能活命，却回头扑向从死人堆里站起来的铁榔头，两人双双倒在鬼子的枪口下；当了汉奸的小刺猬最后良心发现，阻止鬼子扫荡未果杀身成仁……这些人物构成了《血地》具有民间色彩的抗战英雄画廊，他们把战争作为一种平常日子过，就像他们自己编的歌曲那样：“死了的已经死了，咱活着的接着活，该吃咱还吃，该喝咱还喝，该唱咱就唱，该乐咱就乐，气死小日本儿，解放全中国……”这就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过活的冀中人，这就是被战争动员起来的庄稼汉，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锄头，一边打仗，一边干活，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他们的祖先埋在这里，他们要用鲜血和生命誓死捍卫这片热土。任何凶残无道的敌人都不能来惹他们，一旦把他们惹翻了，就会葬身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如今抗战胜利已经76个年头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从研究抗战的史学家到从事抗战题材创作的作家，再到民间的普通老百姓，都对这场战争有了更加客观、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虽然中华民族百余年来饱受外来欺辱，但都没有抗日战争给我们留下的精神创伤更为痛彻，对我们的民族尊严伤害得如此无以复加。清代文人赵翼曾有这样的诗句：“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正因为中华民族经历了这场史无前例的灾难，才沉淀成深不见底的抗战文学富矿，但回过头来看，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们虽然经历了三次开采浪潮，也创作出了如上所述的诸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但跟我们这个民族所经受的那场深重灾难和付出的沉重代价相比，仍是不太匹配的，或者有说不出的遗憾，我们从心底里呼唤，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出现像《战争与和平》《静静的顿河》等世界名著那样鸿篇巨制的抗战文学作品，像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历史地位一样彪炳显赫，但这只是一种愿望，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作家大都作古，即使健在怕也力不从心，而我们这些依据史料加想象的作家，经过几十年的阅读、沉淀与思考，承担起这一使命，并当之无愧地留在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我觉得是非常难的，但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

作家写历史，首先要研究历史，走进历史，而作家与史学家所肩负的使命不同，作家要通过文学艺术手段塑造人物再现历史，让历史成为一种叙事背景，人物的命运发展处于这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中，也就是说，作家不仅要研究历史的脉络，更要走进历史的纹理与骨髓，更要关注和吃透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历史细节，这样所塑造的人物才有特定的历史意义和典型意义。抗日战争是一本具有深度、厚度与广度的历史大书，啃透它相当不易，它不仅旷日持久，且错综复杂，不仅有国民党军队为主力的22次大会战，更有壮怀激烈的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联和华南游击队对侵略者的广泛抗战，这些抗日武装是打败日本侵略军的主要力量，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说：“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应该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的胜利，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抗日战争时期那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群众发动规模如此浩大，战斗意志如此坚强，斗争如此悲壮惨烈艰苦卓绝。应该说，凡是经历过那场战争的人们，只要不当汉奸，不管是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是英雄，那是一个遍地英雄的时代。所以，我们这些作家应该启发心智去写他们的家国情怀，写他们的英雄壮举，写他们的儿女情长，写他们的人性之美，写他们在战争中的普通日子及命运际遇，这便是对中国抗战文学富矿最有价值意义的开掘。

抗战题材文学的新拓展

□张志忠

抗日战争渐行渐远。1945年金陵古城的庄严受降，至今已经有76年，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算起，已经整整90年。亲身经历过那场酷烈战争的人们大多数都已经凋零，战火硝烟也消散在当下熙熙攘攘的和平生活氛围之中。但是，作为一段刻骨铭心的民族记忆，它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作家笔下，一次又一次地让读到它的人们去体味情感的大悲大喜，去反思这场战争留给我们的深刻启迪。回望抗战，是因为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它是凤凰涅槃起死回生的一大转折点，它是中国与世界、人性与人心、生离与死别、残酷与柔情的大舞台，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资源，不断地向后来者发出强大的召唤。在我近年间有限的阅读经验中，不时地会有抗战题材作品闯入视野，让我看到这一领域中作家们的新探索新成就，看到隐藏在纸页后面作家们那炽热、焦灼的心灵。

朱秀海的《兵临碛口》，就是黄河涛声、战地号角的遥远回响。早在20年前，他就写过上下两卷长达70万字的长篇小说《音乐会》，为高山密林中殊死奋战的东北抗日联军谱写出一曲英雄悲歌。《兵临碛口》将目光转向雄峙在黄河岸边的碛口镇。抗日战争爆发，阎锡山的军队兵败如山倒，碛口古镇的兴衰存亡系于雄心勃勃的晋西商会会长程晋元之一身。面对凶残嗜血的日本侵略者，他希望能够以付出巨额钱财的代价确保碛口古镇平安无恙，这样的愿望在现实面前被击得粉碎。好在程晋元没有丧失生存下去并且振兴古镇的顽强信念。碛口古镇在战火中三毁三建，被誉为“不死的碛口”，从商业要津转化为战斗堡垒。程晋元尽其可能地资助共产党八路军，不仅体现出民心所向，更体现出革命对于民众的吸引力号召力。他以其有眼光有胆识的实际行动，为抗日救亡和革命大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直至亲手拿起武器与敌人血拼到底，在国难当头危机重重的民族自救的伟大斗争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和朱秀海一样，在同代人中，徐贵祥是少有的具有战场经验而且执著于战争文学创作的军旅作家。2020年徐贵祥一气推出《英雄山》系列之一、之二的《穿插》《伏击》两部长篇新作，让我们再次拍案惊奇。读徐贵祥的作品，你可以非常形象地在眼前浮出一座沙盘，山川河流、壕沟裂谷、仰角死角、机枪大炮、火力层次、埋伏和进攻，穿插和伏击……这些都是有章法有设计的，读来有一种独特的战争美学的兴味。古人云，自古知兵非好战。战争就是大规模的杀戮与毁灭，血腥残暴，人不如虫豸。但战争又是人类发展和统一进程中无可回避的重要环节，人类世界就是在累累战争中蹒跚前行的。在残忍与屠戮的同时，它将人类的智慧与体能、个体与集团、勇气与胆识、进取与创造、冒险与牺牲等诸多因素都张扬到了极致，自有其风致独标之美，积淀着巨大的历史力量。

《英雄山》系列小说巧妙地采用了时下流行的“角色扮演”，让红军战术专家凌云峰与国民党军“西训团”出身的特务易水寒，在阴差阳错的情况下，错舛各自的身份，加入对方的部队。适逢抗战爆发，昔日生死相争的国共两军的军人，为了共同的抗战目标配合作战。《穿插》突出了战争的传奇性，在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面前处于弱小地位的红军，总是在凌云峰出神入化的战术运用中以弱敌强，出奇制胜。《伏击》中水寒接受教官指派，假冒凌云峰潜入红军内部，本意是要伺机而动，破坏联合抗日的大好局面，孰料弄巧成拙：为了熟悉凌云峰的战斗历程，易水寒反复揣摩穿插战术，竟然也成了穿插战的半个专家；为了理清红军官兵的思想状况和政治态度，易水寒学习红军的政治术语和思想路线。最重要的，易水寒对红军既无仇恨也无血债，加之对凌云峰这样的战地英雄由衷崇拜，阴差阳错地以凌云峰的身份走上抗日战争的前线。《穿插》和《伏击》中的诸多人物，从兄弟阋于墙到外御其侮，都应该被视为民族英雄。只是这些英雄都有各自的独特经历和心灵世界，有各自的惶恐与焦虑，因为加大了各自性格的深刻与区分度，显示出作家描绘战争风云与塑造人物性格的卓越能力。

战争召唤英雄，召唤人性，它也召唤魔鬼，召唤毁灭与兽性。对许多被裹挟进入战争的人们，身处弱势地位如何自处，是个主要问题。邓一光谈到《人，或所有的士兵》的主旨时说：“这个故事不是赞美人类的，不是鼓励人们的，它的暖意是黑暗中的点点萤火，不会放大，而且我一直警惕它们被放大……它只想告诉人们，人最可贵的不是英雄品质，不是理性精神，而是具有软弱和恐惧之心，这是上苍给予人类阻止自我毁灭的最后法器，正是因为有了它，我们才有可能，或者说最终不会成为魔鬼。拥有捍卫恐惧的权利，人类才能继续前行。任何光明的结尾，都与这个旨意相悖。”作品中的主人公郁漱石，以他留学日本和美国，沉溺于世界文学海洋的状态，是最不应该走向战争的，形势所迫加上个人选择，他先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在海外采购物资，后来又参加了一场疑团重生的香港保卫战。对于这场仅仅坚持了18天的战争谜团的追问，对香港的英国殖民者居心叵测弃守香港的回溯，是作品的着力点之一。郁漱石随之被关押在国际战俘营，因其语言能力充当战俘们的翻译，得以见证中日英加印等国军人的各种生态和心态，得以对战争中的人性窥得一角。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战俘们为维护自身尊严的种种努力令人赞叹，绝望中的疯狂与堕落则让人心生畏惧。战俘营的黑暗，最恐怖的是人心的黑暗，不同种族不同国别的所有的士兵，怎样才能守护住“人”的底线呢？

在抗战文学中，非虚构写作有其独到的魅力，它是参与介入现实最深的文学。作家姜宝才用20年之功力，孕育创作了纪实散文集《抗联记忆》。作品洋洋洒洒，写了上百个有血有肉的人物，立体表现东北抗联苦战14年的历史，是文学作品，亦是一部信史，字里行间有一种金石之声，志士血，英雄气。作品素材皆来自对在世抗联老兵的采访和对历史档案的研究。作者自述说，东北抗联没有政府支持，没有军事编制，没有后方，因而所有给养、弹药补充，作为人、军人，生存、战斗，一切的一切，都只能靠自己去解决、用战斗来获取。这是在古今中外的战史上，都属罕见的，甚至是难寻觅的一支队伍。《抗联记忆》每一篇作品都是对民间记忆的挖掘、抢救。用情之深，感动天地。《文山日报》连载的林浪平的《滇南抗战》也可列入非虚构写作，作者依据采访当事人和查阅大量史料，逐年逐月逐日地还原云南边陲抗战往事，将抗日战争中至关重要却又鲜为人知的历史一页推送到读者面前，具有充分的文史价值，更是民族血脉的可贵传承。

网络的力量，为抗战故事的大众传播，提供了新的界面。近年间，我经常在一个叫做“真实战争故事”的APP上，读到许多动人的抗战纪实。它的作者来自四面八方，志趣相投，关心战争中人的命运，更关心经历战争的人们的宝贵情感。该APP创办人“罗伯特刘”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她选取了讲述战争故事的独特角度：人的悲欢并不相同，但人类的悲喜却可以共通。战争的残酷其一在于牺牲，其二就在于生离死别。其中直击抗日战争的篇章居多，如描写云南昆明家庭优越、学识过人的女学生跟随滇军出征台儿庄战场的《80年前日本兵最怕的中国女人，她们上战场还身穿旗袍》，追忆南洋华侨机工归国参加抗战的《中国史上最悲壮的3000名卫国者，全球仅存一人》都是其中的名篇。它还与现实产生直接的互动。《居民楼里藏着大量烈士墓碑，父子守护84年后面临拆迁》一文，讲述抗战时期浙江一所伤兵医院的医生父子两人多年守护那些死在医院中的伤兵墓碑，当下却陷入拆迁困境的故事，这篇文章迅即产生反响，当地文物部门出面，这些即将面临毁掉的墓碑被保护了下来。在这些真实的战争故事中，一个个被战争无辜裹挟的小人物，对人类的悲喜生活有很深的了解。作者们怀着爱与凄楚，从人性与情感的共性——同情，理解，关爱入手，许多长达万言的长文（这也是反网络的短、平、快、散、小、轻之游戏规则的）都赢得了几十万读者的点击，成为抗战题材作品中一种独特的书写方式。

“战争也可以深化人类的灵魂”

——七月派对当下抗战文学的几点启示

□马 兵

抗日战争是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中国全民族的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格局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与抗战有关的文学书写，无论是抗战全面爆发后的战地文学，上世纪40年代战争背景下对民族品德消失与重造的探讨，抑或“十七年”中的革命史诗和英雄传奇以及新时期和新世纪众多以抗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本身即是新文学史的重要脉络。

在抗战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中，七月派是做出较大贡献的一个流派，在风云激荡的岁月里，这个流派的小说家和诗人依凭“文学不肯让位”的坚贞意志，在个人与时代、小我与大我、启蒙与救亡、“思想力”与“艺术力”的多重辩证中努力营造一种洋溢着悲郁苍劲，乃至强悍粗蛮的美学风貌。他们的文学观念和实践，对于今日的抗战文学依然有重要的启示。具体可从三点讨论。

其一，在战争与人的关系中展开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七月派的诸小说家中丘东平的创作开始较早，他是对战时文学“内容的力学的表现”“理解得最深的一个，也是成就最大的一个”。丘东平少年时即参加过由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起义。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始终活跃在战火的最前线，擅长运用类似报告文学或通讯特写的体式，把亲身参与的战争体验忠实地记录下来。在他最好的那些小说比如《第七连》《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和《友军的营长》中，丘东平不但描写出残酷的战斗场面，更发掘出战争对于人性和心灵的考验，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呈现战争的残酷与庄严。《一个连长的战斗遭遇》里林青史在镇守防线时，为了让自己的弟兄免于做炮灰的无谓牺牲，不顾军令主动出击，好不容易杀出一条血路，但结局却是整个连队被友军缴械，而连长本人也因为违反军纪被严惩。对于战争的书写，丘东平的内心无疑是焦灼的，军人的使命让他必须保持“纯钢式的斗志”，担承民族的抗战的道义；而血肉之躯在炮火之中的脆弱以及无谓的牺牲，又每每使他“胆寒”。丘东平的特别就在于他没有回避这份焦灼，而是借此劈开一条道路，从血肉搏杀的战场突进到战士心灵的纵深地带，从战争与人的关系这个角度延展开，他塑造的一系列倔强到近于偏执的人物，都包含着对人性和生命正义的思索以及对民族根性的反省，对打着抗战旗号美化战争、简化战争的思想倾向的警惕，极大地扩充了其时速写式的现实主义表现战争的深度和力度。

丘东平之外还有阿垅、曹白等。阿垅用“如郁闷的云层里逼出了暴雨”一般的文字，忠实还原出战场上弥漫蒸腾的热气和血气。他有一部长篇纪实小说《南京》（1987年正式出版时改名为《南京血祭》），以惨烈的南京保卫战为题材，浓墨重彩地为那些经历“冲锋或扼守、负伤或阵亡、退却或溃败”的无名英雄，“留下了一幅幅可歌可泣的至今仍然令人悲愤填膺的血祭图”。曹白有《这里，生命也在呼吸》《在死神的黑影下面》等，后结集为《呼吸》，多写在难民收容所里的所见所感，笔触细致沉实，善于在细节中折射民众不屈的斗志。

其二，坚持文学之美与历史之力的意义的统一。七月派作家普遍具有“突入生活”的真诚和投入时代的热诚，努力在鲜明的革命倾向和创作的主体意识之间、在使命感与审美之间、在文人的赤子之心和“战士的爱憎”之间完成深度的结合。以七月派的诗人群体而论，在诗行“力的排列”和“美的排列”之间，他们旗帜鲜明地选择前者。在他们看来，韵体诗是从安适的生活环境中产生的，无法表达战争的酷烈，而“力的排列”可以使“诗的血肉浮雕地凸出”。所以，七月派的诗歌内蕴骨力，外加奔腾汹涌的气势，读来如激荡的潮水裹挟而下，让新诗重获因为格律的拘谨和板滞而丧失了的血气和生命感，给读者极强的冲击。七月诗人崇尚“力”，这种力既是要勇于搏击生活的强力，更是在持续受难中由压抑到蓄势到爆破的升华，如化铁笔下的“船夫们”，“以奇迹的力/以永远不屈的意志/以酷烈的痛苦/以寡妇的饥渴的血/以孤儿底泪”，“拖着山岳/拖着河流/拖着古老的中国”艰难向前。阿垅笔下的“纤夫”则有油画和雕塑般血肉贲张的饱满质感，他们“佝偻着腰/匍匐着屁股/坚持而又强进”，努力克服着“铜赤的身体和鹅卵石滩”所构成的“动力和阻力之间的角度”，不是“一里一里”，也不是“一步一步”，而是“一寸一寸”地向着“昂奋的方向”，去迎接“那一轮赤赤地炽火飞瀑的清晨的太阳”，“纤夫”也由此上升为战时中华民族悲郁崇高形象的象征。可见，在聚焦“力”的书写中，七月诗人并没有疏忽对诗歌意象、情感的营造，这些诗歌并不是情感浮泛的口号式的作品，而是把现代艺术精神熔铸到民族战争伟大诉求的结晶，是从血与火中萃取的语言和词藻，他们吹响的“力”的集结号，其实也是“美”的集结号。

其三，在战争的远景中完成审美形象的塑造。七月派的很多作家亲历过抗战，为各种战斗留下见证的文字。此外，七月派也很重视将视野放宽，将民众的日常生活和朴素的个人经验交错于史诗的壮阔中。他们的一些作品，并不直接写战事写抵抗，而是荡开笔墨，在相对迂远的地带，展开审美形象的塑造。读过七月派作品的读者，一定对他们笔下的母亲形象有深刻的印象。在烽烟遍地的战时，母亲所承付的生活压力更甚于男性，她们甘于贫贱苦痛、善良坚忍和深明大义的担当是民族危难中最值得珍视的品质。曾卓的“母亲”是被丈夫遗弃的农家女：“从此一座阴暗的小楼/就是您的世界/您在油污的厨房里/洗衣、切菜、煮饭/或是俯身坐在窗口/缝补和刺绣。”牛汉的“母亲”有沉默却刚烈的脾气：“母亲/穿一身黑布衣裳，/从老远的西北高原，/带着收尸的棺材钱，/独自赶来看我：/听说/我死了，/脑壳被砸烂……”化铁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洗衣妇：“她是从另一个世界里爬出来/从肥皂泡沫里爬出来/从浆硬的衣裳堆里爬出来/从富人们替她造好的窄门里爬出来/用她自己的那双粗糙而裂缝的佣人的手茧!/我的母亲/她还从战争的这头到那头里，/用她农民的纯朴想念已往/向她的儿子诉说一些诚恳的废话。”（化铁：《请让我也来纪念我的母亲》）鲁黎的“母亲”“虽然很老了/但你的枝桠还负载着窝巢/为了一切新的生命/你挡着风雨和冰雪/你在深夜里温暖着孩子的梦/你在清晨召唤者曙光和晨风……”（鲁黎：《母亲》）上述的“母亲”形象，既是诗人具体思亲的情感抒发，更投射对祖国母亲的炽热眷恋，但又绝非泛泛空洞的类比，而是在渗透进诗人真切的人生记忆，将一己的感恩拓展到对祖国前途命运的忧虑和祝福中，让生母与祖国母亲的形象自然地叠加为一。

日本学者竹内好谈到：“我曾以为战争会使中国文学遭到荒废，因为中国遭受的战争灾难比日本严重多少倍。然而，经过战争的中国文学，竟会令人惊异地更加清新娇艳，更具有艺术性，简直令人震惊。我第一次懂得了战争也可以深化人类的灵魂。”七月派的创作就是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和平的今天，抗战文学的创作依然承载铭记历史、铸炼国魂的要旨，我们期待更多“深化人类的灵魂”的抗战文学的佳作。